

## 朝鮮漢語譯官與中朝文化交流網絡的構築： 以李尚迪與阮堂《歲寒圖》的關係為研究中心

羅樂然\*

### 一、引言

清雍正十年(1732)，朝鮮人李宜顯(1669–1745)出使中國，有中國員生跟他說：「吾輩忝生中華，雖與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覩先朝之遺風為快也。」<sup>1</sup>這裡反映十八世紀時一些中國人對朝鮮士人的認識：朝鮮士人有保留明朝服飾的風氣。在明清易代後，朝鮮士人受儒學與東亞世界秩序影響，思想意識有所改變。不少朝鮮使臣會像李宜顯一般，與中國人交談，或參訪一些景觀地點，從而借人或借物來表達對明清易代以後中國社會變化的批判，並暗中強化朝鮮士人對國家的自我意識。然而，十八世紀朝鮮思想界對性理學展開批判與爭論，這種蔑清想法遂不再是唯一的思想主張。<sup>2</sup>受到洪大容(1731–1783)、朴齊家(1750–1815)、朴趾源(1737–1805)等北學派學人對清朝文化再認識的影響，又掌握了各種新知識，<sup>3</sup>朝鮮使節前往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7年10月20–21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之「二十一世紀的明清：新視角、新發現、新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後大幅修改成如今版本。荷蒙三位匿名審查人給予詳細的修改意見，又承《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朱國藩先生細心校對，謹致謝忱。

\* 羅樂然，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

<sup>1</sup> 李宜顯：《陶谷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黨(編)：《韓國文集叢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黨，1998年)，第181冊，卷三十〈壬子燕行雜識〉，頁三六下。

<sup>2</sup>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朝鮮學者從朱子的解說引起了新一輪的討論，此階段的討論重點在於四端七情理氣上。宋時烈的門人權尚夏提出人性物性並不盡同，但他的學生李柬則反對此說，認為人物性俱同。此爭論擴展為門派之爭，即學界所稱的湖洛之爭。洛派沿襲李柬的想法，甚至主張聖凡同心論，主導此一想法的便是洪大容的老師金元行。洪大容受金氏影響，提出「華夷一也」的想法，不再將中國視為胡地，而接受其文化與知識。關於洪大容思想上的轉變與北學派興起的關係，參 Login Lok-yin Law, “Kim Wŏn-haeng’s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on Hong Tae-yong: The Case of Relations between *Nakhak* and *Pukhak*,” *Intenr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20, no. 2 (2015), pp. 125–52。

<sup>3</sup> 朝鮮的北學概念來自朴齊家的《北學議》，而朴齊家所採用的北學想法乃來自《孟子·滕文公上》裡記載的「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見劉殿爵(主編)：《孟

〔下轉頁122〕

中國時，改變了對中國人的一些看法，不再抗拒接觸，甚至把中國人當作抒發情感或傾訴的對象。本文研究的對象金正喜(1786–1856)，就是其中一例。

金正喜是朝鮮後期一位多才多藝的學人，一方面他在經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sup>4</sup>在十九世紀，他在性理學逐漸瓦解的朝鮮社會，<sup>5</sup>提倡「禮」為聖學的想法；<sup>6</sup>他也受清人學術思想影響，<sup>7</sup>促進了考據學及漢學在朝鮮的發展。<sup>8</sup>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與畫家。<sup>9</sup>他的種種經歷，塑造他獨特的人生，讓他的大名不只傳遍朝鮮國內，甚至遠播整個東亞世界。因此，很多學者都希望有系統地了解金正喜的人生與文化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日人藤塚鄰(1879–1948)。藤塚是最早一位以現代學術觀念考察金正喜學術意義的學者，著作讓大家對金正喜有深入的認識。他於京

〔上接頁121〕

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9。關於北學與北學派的關係，參范永聰：〈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載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頁275–76。

<sup>4</sup> 葉國良提到研究金正喜的學術，至少可從經學、理學、考證學、金石學、書畫、古文詩學等六項出發。見葉國良：〈韓儒金正喜的中韓學術因緣〉，載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傳統的詮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379–407。參陳亦伶：〈朝鮮金正喜古文《尚書》考辨對清人學說的接受與轉化〉，《師大學報》第62卷第2期(2017年9月)，頁93–100。

<sup>5</sup> 自1910年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以來，朝鮮性理學儒者備受批判。學者認為韓國淪喪國家主權，全因朱子學思想偏頗而導致。參姜智恩：〈東亞學術史觀的殖民扭曲與重塑——以韓國「朝鮮儒學創見模式」的經學論述為核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2014年3月)，頁175；許怡齡：〈從「儒學」到「儒教」的脈絡性轉換：「西學」與朝鮮思想史的轉換點〉，《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3卷第2期(2016年12月)，頁101–26。

<sup>6</sup> 金正喜自號禮堂，其全集有〈禮堂說〉，解釋禮的意義。雖然葉國良指出「〈禮堂說〉照錄凌廷堪〈復禮下〉，僅刪節『曷嘗有化機也』、『曷嘗有悟境也』二語，又改『本出於釋氏』為『或出釋氏』」，但是金正喜門人編輯金氏全集，仍將該文收錄，說明金正喜服膺凌氏想法。當然金正喜對凌文有所刪節，但這無非說明他吸收了凌氏的部分想法，並非純粹的抄襲。由此可見，金正喜極其重視禮學。見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年)，第301冊，卷一〈禮堂說〉，頁二三上至二四下；葉國良：〈韓儒金正喜的中韓學術因緣〉，頁388–89。

<sup>7</sup> 徐炯遙：〈18世紀韓國儒學與考證學〉，《儒教文化研究》第9輯(2008年2月)，頁95–106。

<sup>8</sup> 賴貴三：〈考古證今 山海崇深——韓儒金正喜與翁方綱、阮元的書法與經學交流〉，《古典文學知識》2014年第4期，頁74–82。

<sup>9</sup> 關於金正喜的藝術成就，參김현권：〈추사 김정희의 묵관화〉，《미술사학》第19期(2005年8月)，頁35–67；김현권：〈秋史 金正喜의 산수화〉，《미술사학연구》2003年第12期，頁181–219；曹悅：〈清代中國書法對朝鮮王朝的影響——以金阮堂為中心〉，《或問》第29期(2016年)，頁119–30；曹悅：〈清朝與朝鮮王朝的書法交流——以金正喜隨父入燕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年第4期，頁180–82；趙太順：〈書法家跨越時空之相遇——略論蘇軾對翁方綱及金正喜之影響〉，《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27期(2007年6月)，頁67–100。

城帝大任教以來，<sup>10</sup>整理金正喜相關的材料，包括他的《歲寒圖》。先後出版多篇學術論文以及專著，從各方面呈現金正喜的獨特人生。<sup>11</sup>馳名的金正喜《歲寒圖》，也在藤塚手上得以保存下來。他退休回到東京後，將《歲寒圖》帶到日本，並製作若干複製品收藏。自此《歲寒圖》一直留在日本，直至朝鮮人孫在馨(1902–1981)多次請求，<sup>12</sup>藤塚才同意將《歲寒圖》帶回到朝鮮。因此之故，《歲寒圖》竟幸運地避開了1944年的東京大轟炸。<sup>13</sup>戰後，大韓民國政府因《歲寒圖》獨有的文化價值，把它收藏在韓國中央博物館。<sup>14</sup>

《歲寒圖》列為當代大韓民國國寶第180號(見下文圖四)，<sup>15</sup>對它發生興趣的學者不止藤塚鄰一位，像美國韓裔學者 Sunglim Kim，也對該圖作了非常全面的研究。<sup>16</sup>她不只整理《歲寒圖》裡的文字與圖像，還將各種題跋、詩文翻譯為英文，方便學界閱讀有關《歲寒圖》的資料。Kim 的研究特別說明，《歲寒圖》應放置在東亞世界脈絡下閱讀。她指出金正喜將《歲寒圖》送給學生李尚迪(1803–1865)，李尚迪將畫帶到中國展示給中國友人，得到中國友人的題跋後，帶回朝鮮給金正喜鑑賞。及後，藤塚鄰在朝鮮半島購得該圖帶回東京，但在孫在馨的多次請求下，同意讓孫氏將畫帶回朝鮮。Kim 指出這段經歷說明《歲寒圖》是一幅跨越時代，跨越地域，在東亞世界遊走的畫像，是一件非常珍貴、極具意義的藝術品。<sup>17</sup>

<sup>10</sup> 藤塚鄰1909年東京帝大畢業後，曾在名古屋高等學校擔任漢文講師，1921年在中國從事清朝經學的研究，開始對朴齊家等朝鮮使節的活動產生了興趣。1926年辭任名古屋講師，轉到京城(今首爾)擔任當時新設的京城帝大的支那哲學講座教席。他在教授漢語與漢文期間，偶然發現朴齊家及其學生金正喜的相關材料，便展開了長達十年的研究，並以金正喜的研究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關於藤塚鄰的生平及其在朝鮮半島的教學，參李曉辰：〈京城帝国大学の支那哲学講座と藤塚鄰〉，《文化交渉：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第1期(2013年1月)，頁275–86。

<sup>11</sup> 果川市秋史博物館(編)：《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果川：果川市秋史博物館，2014年)。筆者2016年10月拜訪果川市秋史博物館，蒙博物館學藝研究師許洪範先生介紹館藏，又承惠館藏圖錄，特此鳴謝。

<sup>12</sup> 孫在馨，二十世紀初朝鮮書藝家，三十年代先後參加「朝鮮書畫協會展」及朝鮮書道展。戰後投身政治運動，擔任民議院議員。他在文化界最大的貢獻是從藤塚鄰手中把《歲寒圖》爭取回到朝鮮半島。參김성환：〈素진 孫在馨 研究〉(益山：圓光大學校碩士論文，1995年)。

<sup>13</sup> 俞弘濬：《완당평전》(漢城：學古齋，2002年)，頁405。

<sup>14</sup> 果川文化院(編)：《후지즈카 추사연구자료》(果川：果川文化院，2008年)，頁47。

<sup>15</sup> 《金正喜筆 歲寒圖》見大韓民國文化財廳網站：[http://www.cha.go.kr/korea/heritage/search/Culresult\\_Db\\_View.jsp?mc=NS\\_04\\_03\\_02&VdkVgwKey=11,01800000,11#](http://www.cha.go.kr/korea/heritage/search/Culresult_Db_View.jsp?mc=NS_04_03_02&VdkVgwKey=11,01800000,11#)，檢索日期：2017年7月29日。

<sup>16</sup> Sung 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ŏn Korean Masterpiece,” *Archives of Asian Art* 56 (2006), pp. 31–60.

<sup>17</sup> *Ibid.*, p. 40.

至於歐美的金正喜研究者，則有著名漢學家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被金正喜的經歷與藝術作品吸引，開始以金正喜作為認識乾嘉學術的使臣為切入點，展開一連串的研究，並藉此了解朝鮮文人如何看待清中葉興起的經學思潮。<sup>18</sup>

學界過去從經學、文化交流史、藝術史、金石學等角度研究金正喜，已有豐盛成果。本文希望以金正喜《歲寒圖》文圖之間的互動為研究個案，特別說明《歲寒圖》的創作及意義不應只限於金正喜的個人想法及成就，而應把重點放在李尚迪於中朝交流的過程裡建立人際網絡所帶來的影響。朝鮮漢語譯官在學術界一直備受忽略，即使過去韓文與中文都有相當豐富研究的領域，但大都從語學史、社會史等角度進行探討，<sup>19</sup>文化交流史或東亞世界的脈絡下探討的研究成果非常缺乏。<sup>20</sup>事實上，東亞各國使節從事外交活動時，從來都不乏譯官從旁解決問題。此外，筆談與酬唱雖然都是文化交流的方式，但從近年整理的史料，發現譯官亦擔負中介職責，引導或改變使團成員的知識與想法，可想而知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面向。

選取《歲寒圖》為例，原因在於金正喜畫這幅畫，除了個人因素，也受他學生李尚迪譯官活動的影響。李尚迪是一名出色的漢語譯官，在華時出版過詩集，也得到很多中國文人的推許。金正喜流放濟州時，給他帶去書籍，施以援手，結果獲贈《歲寒圖》。及後，李尚迪將畫帶至中國，讓中國文人鑑賞，得到各種題跋。由此可見，李尚迪將金正喜與中國文人聯繫起來，產生跨國界的文化交流與感受互動。

因此，本文希望從譯官的職責及其活動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出發，闡述譯官身份和活動如何促使中朝兩國文人跨越地域，在沒有直接接觸的過程中，通過文學活動互相交流。本文也以李尚迪的譯官經歷與其師金正喜所創作的《歲寒圖》，作為研究個案。李尚迪以工作關係形成了中朝之間的文人互動網絡，邀請中國文人在《歲寒圖》上題跋，使《歲寒圖》原作從金正喜的個人創作，在李尚迪有意與無意之間的操

<sup>18</sup> 艾爾曼曾在臺灣、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地的學術演講與活動，介紹他對金正喜的研究成果，促成了對金正喜重新思考的潮流。見艾爾曼 (著)、時霄 (譯)：〈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世界漢學》第14卷 (2014年12月)，頁35-48。

<sup>19</sup> 語學史方面，關於譯學的語言領域研究成果，參遠藤光暁等 (編)：《譯學書文獻目錄》(首爾：박문사, 2009年)。此書編者全面整理朝鮮出版譯學書的各種版本，羅列相關研究成果，有關資訊更新至2009年，對於譯學書及語學史方面的研究趨勢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社會史方面，譯官在朝鮮社會的身份問題，一直是韓國學界關心的課題。參金良洙：〈朝鮮後期の譯官身分에 관한 研究〉(漢城：延世大學校博士論文, 1986年)。譯官在貿易史的角色，特別是如何利用使行活動致富，是學界經常探討的問題。參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漢城：國學資料院, 2000年)，頁44-60；李哲成：〈18세기 후반 조선의 對清貿易 實態와 私商層의 성장〉，《한국사연구》第94輯 (1996年9月)，頁113-50。

<sup>20</sup> Wang Sixiang, "The Sounds of Our Country: Interpreters,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in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ed. Benjamin A. Elman (Leiden: Brill, 2014), pp. 58-95.

作下，塑造成為中朝兩地文人互動後的跨地域、跨時空作品。金正喜《歲寒圖》文與圖之間的互文關係，<sup>21</sup>幫助我們探索該圖背後所連接起的東亞社會網絡，以及中朝兩地的政治訴求等，如何受譯官身份的相關活動及人際網絡影響，產生獨特的文化交流結果。期待本文不但為《歲寒圖》研究提出新的視角考察，也反思中朝文化交流史過去備受忽視的研究視野。

## 二、十八世紀中朝交流與漢語譯官活動

十八世紀中後期洪大容的《湛軒燕記》引起朝鮮士大夫對燕行的興趣，<sup>22</sup>因而使朝鮮人認為燕行是思考與確定自己想法的重要渠道。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另一位重要的北學人物，洪氏的好友朴趾源。朴趾源解釋他之所以燕行，是受到洪大容的啟發：「我東之士，生老病死，不離疆域。近世先輩，唯金稼齋、吾友洪湛軒，踏中原一隅之地。」<sup>23</sup>而事實上，朴趾源撰寫的《熱河日記》，<sup>24</sup>將在北京的經歷及與中國人的交往活動如實記錄，強化對中國器物文化的渴望，回國後提出朝鮮應該學習，這種思想明顯受到洪大容的影響。<sup>25</sup>

<sup>21</sup> 衣若芬研究題畫文學，特別提出在傳統東亞世界與社會裡的各種文與圖的互動，認為圖像往往可以讓我們可以延伸了解背後的各種政治訴求、社會網絡等。本文參考此文與圖間關係的觀念，嘗試將《歲寒圖》的文字與圖像一併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了解背後的文化生產過程。見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1920–30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3期（2015年），頁162–63。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交流所建構的研究框架，見 I Lo-fen, “Text and Image Studies: Theory of East Asian Cultural Diffusion,”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10 (2019), pp. 43–54；衣若芬：〈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理論芻議〉，《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頁101–7。

<sup>22</sup>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14。

<sup>23</sup>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卷十四〈熱河日記·山莊雜記〉，頁二九下至三十上。

<sup>24</sup> 《熱河日記》是1780年朴趾源隨堂兄朴明源（1725–1790）使團前往北京時，按時序記錄往來的日記，主要以紀事本末的方式記述一些重要的經歷與事蹟。《熱河日記》是《燕行錄》研究者最早涉獵並有深度研究的作品，相關學術成果以中、韓、英、日等語發表，數量多不勝數，其中崔洋姬（Yang Hi Choe-Wall）的翻譯有益於學者作更深入的討論。見 *The Jehol Diary: Yōrha ilgi of Pak Chiwōn (1737–1805)*, trans. Yang Hi Choe-Wall (Folkestone,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2010)。

<sup>25</sup> 其實應該更進一步說明朴趾源最受李德懋的直接影響，而李德懋則曾仔細閱讀洪大容在北京的種種書寫。關於李德懋與洪大容的關係，參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頁114。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內容不少部份均參考李氏的《清脾錄》，可見二者之間的微妙關係。見朴趾源：《燕巖集》，卷十四〈熱河日記·避暑錄〉，頁六三下。

把這種北學想法直接視為一種政策或思想主張的人，則是朴趾源的學生朴齊家，其說云：「《會友記》送去耳，僕常時非不甚慕中原也。及見此書，乃復忽忽如狂，飯而忘曬，盥而忘洗。……今湛軒先生一朝結天涯知己，風流文墨，極其翩翩。其人者皆依依焉往日卷中之人也，其言者皆歷歷焉吾輩心頭之言，則彼雖漠然不知相隔於此千里之外，吾安得不憐之愛之，感泣而投合也哉！」<sup>26</sup>可知朴齊家看過洪大容在北京的經歷後，渴望親身體驗，而最終他也成為了燕行使節，並與當時四庫全書總裁紀昀(1724–1805)結為好友，<sup>27</sup>相互唱酬。<sup>28</sup>從這些例子可見，中朝兩國文人藉着文字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藝創作由兩人或兩個群體互動產生。

不過，學術界過去去探討中朝士大夫的交流時，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就是彼此交流時，是否有文化間的媒介呢？石守謙在提出「東亞文化意象」的研究框架時說：「還有一群實際上參與到這個文化互動『過程』中的，而比較未『直接』牽涉到意象製作與運用者，實亦扮演著幾乎同等重要的角色，卻常被忽視。……這些『外圍的中介者』雖然不是在地意象形塑的核心，卻在過程中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幾乎可以想像為意象傳遞中的『管線』，如果沒有這些管線，文化意象在東亞空間中的長距離移動，或許根本不會發生。」<sup>29</sup>我們處理資料時，在資料的表層上，基本如石守謙所說，沒有留下證據讓我們認識這些交流過程裡的管線或外圍中介者，故石氏提出以行動面來彌補有關思考的不足。但何謂行動面？需回到本文的個案——金正喜的《歲寒圖》——再作思考。

以金正喜《歲寒圖》為例，為甚麼馮桂芬(1809–1874)、張曜孫等人會在圖上面題字呢？我們應從以下思路出發：金正喜的文采與學術成就固然是串連兩地交流的主題，但不至於可以決定《歲寒圖》的讀者及後續發展。那麼誰可作出選擇？必須同時考慮當中由誰擔當中介者，亦即獲贈《歲寒圖》的譯官李尚迪，他為何或如何會有這群中國友人，並把《歲寒圖》帶到中國去作交流呢？關鍵在於朝鮮譯官長久以來也是朝鮮文人或朝廷對外交流與對話的重要中介。單靠常見的歷史文獻較難從全面的

<sup>26</sup> 朴齊家：《貞菴集》(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年)，文集卷四〈與徐觀軒〉，頁347。

<sup>27</sup> 紀昀與朴齊家至交，與另一位使節洪良浩也時相往來。參孫衛國：〈乾嘉學人與朝鮮學人之交遊——以紀昀與洪良浩之往來為中心〉，《文史哲》2014年第1期，頁112–26、167–68；徐毅：〈傾蓋如故，同氣相求——洪良浩與紀昀交遊考述〉，《溯上古典研究》第31輯(2010年6月)，頁409–39。

<sup>28</sup> 紀昀詩贈朴齊家曰：「貢篚趨王會，詩囊貯使車。清姿真海鶴，秀語摠天葩。歸國憐晁監，題詩感趙驩。他年相憶處，東向望丹霞。」朴齊家步韻奉和：「辱題僧孺館，勝御李鷹車。披扇驚文藻，陳詩媿正葩。蟲心猶慕鵠，鷲足敢先驩。喜我書廚潤，歸沾玉井霞。」從唱酬詩句看，則二人互相頗為欣賞，並非泛泛之交。見朴齊家：《貞菴集》，詩集卷三〈次韻禮部尚書曉嵐紀公昀詩扇見贈〉，頁87–88。參徐毅：〈楚亭朴齊家與清文人文學交遊考述〉，《중국과 중국학》第17號(2012年9月)，頁303–34。

<sup>29</sup>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載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

視角去認識譯官，<sup>30</sup>但是探討譯官的行動方式，特別是他們如何通過身份與職責不自覺地構築了一個跨國的人際網絡，便可印證《歲寒圖》的故事如何在中朝文化交流中得以流傳。近年，已有學者嘗試以《燕行錄》或其他史料，印證譯官的交流角色。例如，1722年擔任燕行副使的李正臣（1660–1727），很多時候依賴隨行譯官金慶門（1673–1737）的說明，以了解明清易代歷史的知識或是一些北京景觀背後的故事；<sup>31</sup>穆克登（1664–1735）在1712年上天池定界，也受惠於金慶門及其父金指南（1654–1718）的交涉，而得到了朝鮮朝廷期盼的邊界安排結果，<sup>32</sup>可見譯官擔任外交中介者的貢獻。本文從探討譯官中介者角色的視野出發，或有助學術界重新了解阮堂《歲寒圖》更多未有受人關注的一些細節。

朝鮮譯官的媒介作用隨着康雍乾盛世而變得更加顯著，主要原因是朝鮮士大夫在京使行期間的活動空間得以擴大，增加了與中國人交流的機會，因此也更需要中介協助處理各種事務。朴齊家《北學議》即提到：「清興以來，國朝士大夫，以中國為恥，雖黽勉奉使，而一切事情，文書，言語之去來，悉委之於譯。」<sup>33</sup>朴趾源也有相近的想法：

清興百四十餘年，我東士大夫夷中國而恥之。雖黽勉奉使，而其文書之去來，事情之虛實，一切委之於譯官。……譯官遑遑然承奉之不暇，常若有大機關之隱伏於其間者，此使臣妄尊自便之過也。使臣之於任譯，太疑則非情，而過信亦不可。如有一朝之虞，則三使者其將默然相視，而徒仰任譯之口而已哉。為使者不可以不講。<sup>34</sup>

<sup>30</sup> 這裡以《通文館志》、《同文彙考》二書為例說明。《通文館志》的主要編者是著名譯官金指南、金慶門父子，他們為了呈現心目中譯官的文化與外交地位，將出行的慣例及一些重大情事編訂成書，是非常獨特的材料。不過，雖然《通文館志》內偶有關於譯官貢獻的記載，但資料大多是在十八世紀以前的，而本文主要探討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情況，這些材料變得次要。《同文彙考》輯錄司譯院官員所採集到的各種資料，包括譯官出行的手本及官員的見聞，以便往後的官員就類似情事預先進行安排。《同文彙考》記載了大量譯官的具體工作情況，是很重要的譯官活動歷史根據。關於《通文館志》的編輯情況，參金鍾圓：〈通文館志의 編纂과 重刊에 對하여 —— 田川氏의 說에 對한 몇가지 存疑〉，《역사학보》第26輯（1965年10月），頁180–94。關於《同文彙考》的使用，參林侑毅：〈由《同文彙考》「使臣別單」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 —— 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35（November 2016），pp. 343–71。

<sup>31</sup> 羅樂然：〈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 —— 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33卷第3期（2015年9月），頁345–78。

<sup>32</sup> 羅樂然：〈東亞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朝鮮譯官角色 —— 以譯官金指南的活動為中心〉，《東洋學》第62輯（2016年1月），頁55–76。

<sup>33</sup> 朴齊家：《貞菴集》，《北學議》內編，頁413。

<sup>34</sup> 朴趾源：《燕巖集》，卷十三〈熱河日記·行在雜錄〉，頁四五下至四六上。

朴趾源警告其他使節，不要完全依賴譯官處理各種交涉問題，這就說明當時很多使節都「以中國為恥」，不願處理各種文書與言語交涉的事情，所以「悉委之於譯」，使譯官在這些朝貢活動的責任與角色變得多樣而重要。譯官工作需要多次來往中國，因此接觸中國人的機會遠較士大夫為多。而且，士大夫大多無法與中國人交談，而需要依賴朝鮮譯官。上文提及的李正臣，在其《燕行錄》中對金慶門的讚譽，反映了譯官左右使節與士大夫的想法。<sup>35</sup>

此外，晚清董文煥(1833–1877)編修的《韓客詩錄》，則有助說明譯官在交流過程的具體實例。<sup>36</sup>雖然《韓客詩錄》最終並沒有出版，但董文煥在日記和著作裡提到這個詩集收錄了大量朝鮮文人的作品。根據董氏日記，他的藏書就有李尚迪、李廷稷(1786–1816)、李彥瑱(1740–1766)、李容肅(1818–?)等的作品。事實上董氏收藏了不少譯官的詩集，這因董文煥收錄詩集的過程全賴譯官的幫助。<sup>37</sup>由此可見，譯官的興趣、個人背景及人際網絡，主導了一些中國文人的閱讀習慣甚至是認識朝鮮的角度。因此，在中國文人間傳播有關朝鮮的知識，定必會因中介者的行動與習慣而形塑。以十八世紀以後的文壇為例，這種中介者大多是派遣到中國的譯官。

一些譯官像李尚迪般，能夠在使行期間，利用各種機會，在北京進行各種文藝活動。衣若芬的論文介紹李尚迪時，還特別強調他獨特的譯官身份：「蓋李尚迪諳漢語，能與中國文人流暢溝通而無須筆談，且出使頻繁，廣結善緣，圖像與文字交輝，成為特殊景致。」<sup>38</sup>李尚迪，字允進、惠吉，號藕船先生，朝鮮晚期重要譯官。<sup>39</sup>他出生譯官世家，父親李命裕嘗任司譯院僉正，1825年(清道光五年)朝鮮譯科科舉一等及格。<sup>40</sup>據李春姬與溫兆海等的研究，李尚迪前後使華十二次，平均每三年來華

<sup>35</sup> 羅樂然：〈燕行使團擔任文化媒介的朝鮮譯官——以金慶門為研究中心〉，頁345–78。

<sup>36</sup> 董文煥，1856年進士，先後任官於甘肅、山西、陝西等地，雖然無甚政績可言，但在文學創作與音韻學上倒有不少著作留下，如《硯樵山房詩》、《聲調四譜圖說》、《集韻編雅》等。參任瑞：〈明清以來山西洪洞董氏家族發展研究〉(太原：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17–25。

<sup>37</sup> 劉婧利用各種有關董文煥的材料，提出證據證明譯官對詩集收入《韓客詩錄》所作出的貢獻。見劉婧：〈通過董文煥日記考朝鮮詩文集流入中國及朝鮮譯官的作用〉，《東亞人文學》第12輯(2007年12月)，頁255–76。

<sup>38</sup>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2期(2015年12月)，頁68。

<sup>39</sup> 李尚迪位列象胥四家之一，深受朝鮮漢文學史家重視。所謂象胥四家，是洪世泰、李彥瑱、鄭芝潤、李尚迪等四位在十七世紀以後的譯官詩人，他們帶着譯官的身份創作文學，彼此有互相聯繫的文學關係。參 정후수：〈역관(譯官)의 문학활동——조선조 후기를 중심으로〉，《漢城語文學》第3輯(1984年)，頁61–70。

<sup>40</sup> 司譯院(編)：《譯科榜目》(서울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古4650-4)，卷二，「道光乙酉式年」條，頁二六下。

一次，<sup>41</sup>與超過一百位中國人交遊，<sup>42</sup>當中的學者又以文人風格、學術與地域所在，分為阮元學派、<sup>43</sup>常州文人、桐城派、宣南詩社(或稱消寒詩社)等，<sup>44</sup>說明李尚迪交遊之廣。雖然他沒有如洪大容等士大夫一樣撰寫燕行錄，但從他的《恩誦堂集》大抵可了解他擔任譯官的經歷。他燕行所經之地甚多，包括瀋陽、姜女廟、會寧嶺、山海關等。職責方面，除了翻譯外，也需做一些情報收集工作。李尚迪有詩云：「日邊消息杳難尋，爆竹千門散積陰。燕柳含煙春色淺，唐花如雪客愁深。三盃灑灑傾藍尾，萬里懸懸隔素心。莫遣鷄人催箭漏，今宵一刻值千金。」<sup>45</sup>此外，他懂中文，可以在北京就中文發音問題與中國人交流：「一方自有一方音，謾把諧聲辨古今。心折傳翁曉人語，汀芒喚起顧亭林。」<sup>46</sup>

李尚迪身處的朝鮮是一個身份階層鮮明的社會，故不免對士途有悲觀與失望的想法。<sup>47</sup>朝鮮科舉史學者李成茂認為，傳統朝鮮社會的兩班子弟，深受儒家君子不器

<sup>41</sup> 關於李尚迪，韓文可參 정후수:〈이상적 시문학 연구〉(漢城：東國大學校博士論文，1988年)；中文可參李春姬：〈朝鮮詩人李尚迪與道咸文人的交遊〉，《外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2期，頁33-36；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sup>42</sup> 李春姬根據李尚迪的《懷人詩》、《續懷人詩》、《西笑編》，得出李尚迪友人約有一百一之數。見李春姬：《19世紀韓·中文學交流——李尚迪을 중심으로》(首爾：開文社，2009年)，頁86-88。

<sup>43</sup> 關於阮元，參 Betty Peh-T'i We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關於阮元學圈，參邱培超：《自「文以載道」至「沈思瀚藻」——學術史視域下阮元學圈的文統觀及其意義》(臺北：大安出版社，2012年)。

<sup>44</sup> 宣南詩社成員主要是一批翰林院官員，他們大都在宣武門外往來，而燕行使節亦多於宣武門附近一帶聚居生活，因此他們之間在北京產生了一些文化認可。關於宣南文人群體研究，參魏泉：《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sup>45</sup>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707冊，卷五〈燕館除夕，正使邀諸幕賓小酌，次杜共賦〉，頁五下。

<sup>46</sup> 同上注，續卷一〈燕館與人論華語〉，頁十下。

<sup>47</sup> 李尚迪的遭遇與時代的局限有關，這一點可以從當時朝鮮燕行使節金永爵(1802-1868)的筆談可以反映：「士夫世世為士夫，庶人世世為庶人。庶人雖有才德，無以進用。……階級一定，十世不得免。如李惠吉者，文才實可進用，乃拘于門閥，屈於象譯，是可恨也。」見吳昆田：《漱六山房全集》，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29冊，卷六〈朝鮮使者金永爵筆談記〉，頁二下至三上。參孫衛國：〈道咸間朝鮮通譯李尚迪與張曜孫家族之交往〉，載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頁452。

想法的影響，<sup>48</sup>鄙視工匠。李尚迪就曾因譯官地位低微而有所感觸：「記曾身惹御爐烟，捐棄空箱值幾錢。但向酒家償宿債，一蓑歸老白鷗邊。」<sup>49</sup>可見譯官深受身份制度的困擾。

然而，李尚迪在中國人眼中，卻是一位在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詩不單收入符葆森(1814–1863)《國朝正雅集》，<sup>50</sup>也得到不少文人的重視與支持，所著《詩集》在北京琉璃廠刊印。<sup>51</sup>許宗衡(1811–1869)為李尚迪的詩集撰寫序時提到：「詩之為教，其冥契於神明，而顯徵於事物；其託詞於諷諭，而歸義於忠孝。深之於學問，積之於閱歷。本天理之感召，達人心之微茫。其所散布為境且萬，而窮原竟委，靡不本乎情之真；因其情之真，可以知其文之至。然則，余雖未盡觀君之詩，而君詩之善則無不可見也。」<sup>52</sup>可知李尚迪廣受中國文人讚譽，這也解釋了李尚迪為何願意接觸那麼多不同背景的文人。

譯官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中國人接觸何種朝鮮文學作品。像英年早逝的朝鮮漢語譯官李彥瑱(1740–1766)，原在朝、中兩國文壇無籍籍名，但是兩位漢語譯官李尚迪與李容肅為了讓更多認識這位他們認為詩才獨特的譯官詩人，合力整輯他的詩作，並由李容肅帶到中國，讓董文煥收錄在他的《韓客詩錄》裡面。<sup>53</sup>於是本來不為人所知的李彥瑱，他的生涯、遭遇以及書寫，通過譯官李尚迪的人際網絡及使行工作，被素未謀面的中國文人所認識以及體會，中國文人因而得以認識由李尚迪等譯官所形塑的朝鮮文壇及相關故事。<sup>54</sup>此例足以說明，在呈現朝鮮某種文壇現況與他們期盼清人所認知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李尚迪等朝鮮譯官有一定的主導性。

當譯官有如此具大意義的媒介作用，他們的個人經歷對他們所引發的文化互動便顯得相當重要了。李尚迪一生最重要的老師，是《歲寒圖》作者金正喜。與金正喜

<sup>48</sup> 李成茂：《韓國의 科擧制度》(漢城：集文堂，2000年)，頁172。

<sup>49</sup>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續集卷二〈典朝衣〉，頁十上。

<sup>50</sup>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中央研究院藏清咸豐六至七年(1856–1857)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

<sup>51</sup> 孫衛國：〈清道咸時期中朝學人之交誼——以張曜孫與李尚迪之交往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110–11。

<sup>52</sup> 許宗衡：〈序〉，載李尚迪：《恩誦堂文集》，續集序頁一下。

<sup>53</sup> 李容肅是李尚迪的學生，經常代為贈人詩集，例如董文煥的日記便提到，同治二年正月十八，「菊人送來李藕船函寄天籟詩藁、恩頌堂前後集。」劉婧論文曾引該段，但所引有誤，應一檢原書。見董文煥：《峴樵山房日記》，載董壽平、李豫(主編)：《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冊，頁174。

<sup>54</sup> 季南指李彥瑱「託譯官將自己的詩文集帶給董文煥」，此說不確，因為李彥瑱去世時，董文煥尚未出生。不過，季南的觀察還是不違歷史事實，就是譯官是中韓文人中間的媒介。見季南：〈明清時期朝鮮漢籍的回傳及其作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頁118–24。

的學術淵緣，也成為了李尚迪與中國人展開學術與文學對話的關鍵。宣南詩社、阮元學派等文人得悉李尚迪是金正喜學生，便邀請他參加雅會，又展開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sup>55</sup>李尚迪對於他本人作為金正喜學生的身份，表現得相當重視。

李尚迪在〈奉輓秋史金侍郎〉裡，<sup>56</sup>除了攄發受學於阮堂先生時的感受，也說明其師金正喜各方面的成就，<sup>57</sup>特別提到「素心蘭又歲寒松」。其實反映金正喜對李尚迪來說，《歲寒圖》是他對金正喜最深刻印象的表述。金正喜繪此圖最初的目的，只是感激李尚迪不辭勞苦攜書至濟州，但是金正喜沒有想過，《歲寒圖》被轉化為中國人認識朝鮮社會以及他個人經歷的關鍵媒介。李尚迪基於譯官職務上的方便，容許中國人觀賞閱讀。換句話說，《歲寒圖》的鑑賞者，決定權不在作畫者金正喜，而在受贈者李尚迪。

以上述時代背景與朝鮮譯官的媒介活動為出發點，可以發現《歲寒圖》的誕生與流傳不是金正喜單方面決定的，當然《歲寒圖》故事相關脈絡也需要有系統地梳理出來，但更重要的是探討李尚迪個人背景及職責與《歲寒圖》的密切關係。因此，本文將會從譯官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歲寒圖》的故事。過去學者閱讀《歲寒圖》只以金正喜為中心，而忽略其他因素，導致此作品的學術意義未有深入探討，譯官所做出的文化操作也沒能釐清。本文最終希望借李尚迪擔當譯官所帶來的影響，以《歲寒圖》為例，來思考譯官等中介者如何形塑東亞世界一種多向的思考環流網絡，為學界提供一個思考東亞文化、話語與思想的研究框架。

### 三、金正喜事蹟與《歲寒圖》的文與圖

金正喜系出的慶州金氏，在朝鮮時代屬於兩班貴族。生父金魯敬(1766–1837)，因兄長金魯永沒有子嗣，將金正喜過嗣予伯父，但金正喜與生父關係仍然相當密切。後來金魯敬受命為副使，<sup>58</sup>出使北京。金正喜早年深受朴齊家「北學議」的想法影響，曾

<sup>55</sup> 以張曜孫為例，衣若芬提到：「金正喜與張曜孫之父親張琦、叔父張惠言(1761–1802)相識，李尚迪因金正喜之故，於一八三六年於燕京結識張曜孫。」(〈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67)

<sup>56</sup> 李尚迪：《恩誦堂文集》，續集卷三〈奉輓秋史金侍郎〉，頁十上至十下。

<sup>57</sup> 李尚迪弟子金奭準撰〈李藕船先生傳〉，借用不同文人的用語來記述李尚迪一生，當中提到李尚迪是金正喜的高足：「嘗為金秋史侍郎高足，文望日隆。」見金奭準：〈李藕船先生傳(仿史傳集句之例)〉，載李尚迪(著)、金奭準(編)：《藕船精華錄》，朝鮮高宗六年(1869)刊本，序頁二上。參孫衛國：〈道咸間朝鮮通譯李尚迪與張曜孫家族之交往〉，頁452–54。

<sup>58</sup> 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在1809年，金魯敬擔任冬至兼謝恩副使。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純祖實錄》，卷十二，純祖九年十月乙卯，頁四九下。

賦詩曰：「慨然起別想，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為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己。」<sup>59</sup>可見四海結知己的想法是不少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的共同心願。

1809年，金正喜時年二十四歲，初抵北京。因他擔任子弟軍官，並非使行的重要成員，無需兼顧各種禮儀或職責，使他有機會與當地文人結交。這些文人不少都有跟朝鮮文人交流的經驗，如乾隆年間進士曹江，在北京書肆中認識柳得恭（1748–1807），結為好友。<sup>60</sup>曹江曾贈一扇予柳得恭，扇面寫道：

柳君惠風，予遇之書肆中，一見如故，相與訂交。既半月敘，君又將歸東海，正未知相逢何日，能不悵然。君屢索拙作，自顧不堪呈教。君行有日，情不能已，姑踐昔言，知君他日偶一展玩，或憶及今日之敘云爾。海上玉水未定艸。<sup>61</sup>

自此，曹江與朝鮮文人時相過從，故當曹江得悉金正喜與柳得恭等人認識，特邀他相見：

東國有金正喜先生字秋史，年今廿四，慨然有四方之志，嘗有詩云：「慨然起別想，四海結知己。如得契心人，可以為一死。日下多名士，艷羨不自己。」其趣尚可知也。與世寡諧，不作功令文字。放浪形骸之外，能詩能酒。酷慕中州，自以謂東國無可交之士。今方隨貢使入來，將交結天下名士，以效古人為情死之義云。<sup>62</sup>

「不作功令文字」，即謂金正喜不作科舉應制文字。當時像曹江般的士大夫數並不少，得知金正喜來華後，如徐松、翁方綱父子、<sup>63</sup>阮元等紛紛與金正喜結交。當然他們與金正喜相遇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種中朝文人間的文化傳承。洪大容開啟朝鮮士大夫到北京結交名士的潮流，<sup>64</sup>朴齊家、朴趾源、柳得恭等踵繼其後。1810年金正喜到訪北京時，遇到的中國人有像曹江一樣的，過去曾與朝鮮士大夫交往，如朴齊

<sup>59</sup>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国書刊行会，1975年），頁78。

<sup>60</sup> 關於柳得恭與中國友人的關係，參謝正光：〈嘉慶初年京師之學人與學風——讀柳得恭《燕臺再遊錄》〉，《九州學林》第3卷第3期（2005年秋季），頁220–42。

<sup>61</sup>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80。

<sup>62</sup> 同上注，頁81。

<sup>63</sup>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1輯（2015年5月），頁350–55；趙微：〈論金正喜與翁方綱的學術交流〉，《漢字漢文研究》第8期（2012年12月），頁31–47。

<sup>64</sup> 《日下題襟集》，清朱文藻編，收入編者友人嚴誠、潘庭垂、陸飛與洪大容等朝鮮使節的交流與唱和，原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及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劉婧點校本。



圖一：朱鶴年繪《秋史餞別宴圖》（《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21）

家與翁方綱見面，<sup>65</sup> 阮元是朴齊家與柳得恭的好友。<sup>66</sup> 可見這些中朝士大夫之間的交流，背後有互相緊扣的人脈關係網絡，成就了金正喜與不同學派士大夫的友誼。

金正喜期盼與中國人見面，原因有二：其一他能放下各種在朝鮮面對的困境，其二他在北京活動可以得到不少中國人的青睞。圖像與文字的互動，恰巧為我們印證了上述金正喜在京的想法與見解。當金正喜使行接近尾聲快要離京東歸前，一群文人在京設宴送別。據當時的圖像題記名單，除了雅集主人朱鶴年以及阮元，參加者還有李林松（1770–1827）、洪占銓（1762–1812）、譚光祥、劉華東（1778–1841）等。<sup>67</sup> 見面少不了贈書送字給金正喜，朱鶴年還畫了一張《秋史餞別宴圖》，<sup>68</sup> 描繪當天雅聚的盛況。從圖中可以看見，幾位身穿清服的文人與身穿朝鮮士大夫服飾的金正

<sup>65</sup>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63–64。

<sup>66</sup> 艾爾曼：〈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頁38–40。

<sup>67</sup> 雖然這些文人沒有固定的地域關係，像劉華東是廣東狀師，李林松是上海一帶文人，但無疑都是阮元學圈中人。阮元成為了中介者，使這些並非享有盛名的清朝文人都在金正喜的記憶之中。

<sup>68</sup> 此為臨摹版，朱鶴年原畫，1940年李漢民臨摹，全畫大小22 x 324 cm。見《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20–21。

喜暢談，屋外還有人絡繹赴會。由此看來，朱鶴年他們對金正喜極為欽佩，因而流露了依依不捨的心情。

從畫中人的服飾可以很容易分辨出誰是金正喜，因為只有一人穿着朝鮮官服，其他人則穿着清朝官服。<sup>69</sup>這群與金正喜雅聚的中國人，相當期盼金正喜前來，也不捨他即將回國。圖中刻意描寫有人從外趕往會場，可見大家對這次宴會是如何重視。雖然圖中沒有點明誰是阮元，但從圖旁的題句「勝會同集者，揚州阮芸臺」，<sup>70</sup>可知在宴會中阮元為座上客，也可見金正喜與阮元所建立跨地域的深厚友誼。

阮元與朴齊家、柳得恭是相交甚得的好友，這種互動網絡也使金正喜等朝鮮文人對阮元學術經歷有深刻的認識，因此金正喜也希望藉此次燕行與他相見，以圓其多年心願。<sup>71</sup>阮元與金正喜相見，贈與所著書，金正喜說道：「此《學經堂文集》之第六卷。庚午春，謁雲臺先生於泰華雙碑之館，抽贈此卷，時原集未盡校勘矣。」<sup>72</sup>即使書未校完，已迫不及待贈予金正喜，可見阮元對他是如何的看重。在思想上金正喜也受阮元的影響，何以見得？就在金正喜東歸以後，將原來常用的自號「秋史」改為「阮堂」。<sup>73</sup>這點足以反映他希望向阮元致敬，也希望向他學習。金正喜回國後有〈我生九夷〉詩，反映他使華的經歷，特別說明阮元在文學、經籍、金石學等方面對他的啟發：

我生九夷真可鄙，多媿結交中原士。樓前紅日夢裏明，蘇齋門下瓣香呈。後五百年唯是日，閱千萬人見先生。芸臺宛是畫中覩，經籍之海金石府。土華不蝕貞觀銅，腰間小碑千年古。化度始自蠶蟀齋，攀覃緣阮並作梯。君是碧海掣鯨手，我有靈心通點犀。楚雲墨妙天下聞，句竹圖曾海外見。況復古人如明月，却從先生指端現。翁家兄弟聯雙壁，一生難遣愛錢癖。<sup>74</sup>

金正喜撰此詩，是因為有感於身為「九夷」，有愧於「結交中原士」。這些中原士像芸臺與翁家兄弟，給予他很多啟發，使他獲益匪淺。朝鮮文人在十八世紀以前明顯有

<sup>69</sup> 衣若芬分析圖中人物，明確指出金正喜與阮元的位置：「朱鶴年以俯瞰的視角，畫怪石古松圍繞的庭園屋舍裡，五人聚桌而坐，一裡僕人侍立於側。五人中，頭戴笠子、穿著朝鮮服裝的人，即為金正喜。金正喜右側舉杯致意的人，想必為主人阮元。」（〈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65）

<sup>70</sup> 《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21。

<sup>71</sup> 陳東輝：〈阮元在中朝關係史上的若干事蹟考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43-46。

<sup>72</sup>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114。

<sup>73</sup> 金正喜詩云：「攀覃緣阮並作梯。」按金正喜自號阮堂、寶覃齋，可見他仰慕阮元、翁方剛（覃溪），有心承繼。參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頁351。

<sup>74</sup>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九〈我入京，與諸公相交，未曾以詩訂契。臨歸不禁悵觸，漫筆口號〉，頁十八上。

蔑清的華夷觀念，<sup>75</sup>但在金正喜的論述裡，卻自稱「九夷」，表明自己學識不及當時清朝名流如阮元、翁方綱等，並期待從他們身上學習。可見「實事求是」是金正喜的思想主導。他拋棄朝鮮社會氛圍下的華夷觀，視自己為中國文化與學術的承傳者。

然而，金正喜東歸以後，心情並不如他在中國時那麼愉悅。他回國後一直因安東金氏與豐壤趙氏之間的勢道之爭，<sup>76</sup>面對多宗獄案。1840年，金正喜的政治與文化好友趙寅永（1782–1850）被安東金氏打擊，<sup>77</sup>他也受到連累，流放濟州島。

流放濟州島是金正喜人生最感困擾與痛苦的階段，幸而還有學生遠赴濟州島探望，令他稍感安慰。舉例而言，他的學生許鍊（1809–1892），<sup>78</sup>畫了一張《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以蘇東坡流放海南島的經歷，來比照金正喜流放濟州島的遭遇。<sup>79</sup>

在中國，自宋以來，像許鍊所摹的東坡笠屐圖有不同的版本在文人間流傳，如宋趙孟堅的《東坡硯背笠屐小像》、明唐寅（1470–1523）的《蘇文忠公笠屐圖》和李公麟（1049–1106）的《東坡金山像》等，都有一段流傳的歷史。而在朝鮮半島，蘇東坡得到不同時代學者的欣賞與喜愛，「東坡熱」自高麗時代到朝鮮中後期依然不減。<sup>80</sup>金正喜前往北京時，與好友翁方綱相會，得以飽覽翁氏所藏蘇笠屐圖像，並且從中臨摹了一個吳歷（1637–1718）的版本。<sup>81</sup>

無論在中國文人還是朝鮮文人眼裡，東坡的笠屐形象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在流放生活中超然面對現實環境的思想境界。蘇軾被貶瓊州，一直以穿着笠屐的形象為人所知，歸根究柢，這種造型最適合在南方潮濕炎熱天氣生活的形象。但同時間，這個造型在文人眼中卻是蘇軾在流放期間仍能從容面對困境的心情，於是成為後代緬懷蘇東坡的重要形象。後來金正喜因勢道之爭流放濟州時，許鍊便以笠屐圖的形象呈現金正喜的處境。事實上，許鍊除了把金正喜所摹的吳歷版本再摹一次，更為他繪畫了《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把他比喻為流放南方的蘇軾。許鍊不只是純粹把金

<sup>75</sup> 洪大容燕行前後與友人金鍾厚就金氏認為中國是夷狄之地的觀點展開論戰，吳政緯利用這場論戰歸納出十八世紀以前不少朝鮮士人都視中國人為夷狄，而洪大容對如此觀點的質疑遂成為了朝鮮文人的中國論述與華夷觀重新定位的關鍵。見吳政緯：〈思明與認同——朝鮮士人的中國論戰（1765–1800）〉，《史原》復刊第5期（2014年），頁133–83。

<sup>76</sup> 정후수: 〈추사 김정희의 제주도 유배생활〉, 《한성어문학》第15輯(1996年), 頁33–63。

<sup>77</sup> 當時政府的判刑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憲宗實錄》，卷七，憲宗六年九月辛卯，頁十二下。

<sup>78</sup> 許鍊是朝鮮前期士大夫許筠（1569–1618）的後人，號小痴、老痴、石痴。深受中國水墨山水畫家王維的影響，改名許維，視為一種藝術的繼承。

<sup>79</sup>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頁356。

<sup>80</sup> 柳素真：〈高麗時期的「東坡熱」與李奎報詩歌〉，《東亞文化》第50輯（2012年），頁75–152。像與金正喜同時代的李德懋，也常參考引用蘇東坡的思想與觀念。參尹浩鎮：〈韓國漢文學의 東坡受容樣相〉，《중국어문학》第12輯（1986年12月），頁129–47。

<sup>81</sup> 姜慶姬：〈조선후기 崇蘇熱과 東坡笠屐圖〉，《중국어문학논집》第65輯（2010年12月），頁415–31。



圖二：許鍊摹《蘇東坡笠屐圖》許鍊（摹）：《蘇東坡笠屐圖》，1847年，42 x 13.2 cm（《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46）



圖三：許鍊《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許鍊：《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十九世紀，51 x 24 cm（《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47）



圖四：大韓民國文化財廳網站所示的《歲寒圖》圖像

正喜的遭遇比喻蘇東坡，而是把蘇東坡作為讓金正喜把自己情感投射的對象，用文字和圖像表達金正喜表露被流放的心跡，並提出某種政治訴求。<sup>82</sup>許鍊選擇東坡笠屐像作為原來畫像主體來呈現金正喜的想法，也是基於他在北京的燕行，翁方綱讓他鑑賞東坡的真蹟，<sup>83</sup>而東坡當時也是因為政見不合流放海南的，這種畫像於是聯繫上了金正喜的學思背景，也是後來出現在《歲寒圖》的背景。

許鍊贈畫予金正喜，金正喜固然喜不自勝，但令他更加感動的，則是他另一個學生漢語譯官李尚迪，從中國給他帶來書籍。金正喜以當時流放的身份，根本無從買書。然而，李尚迪卻因職務之便，可以購入各類中國書。李尚迪每次探訪金正喜，都會帶去一些中國書，如桂馥的《晚學集》、惲敬<sup>84</sup>的《大雲山房文稿》、魏源與賀長齡合編的《皇朝經世文編》。為了投桃報李，金正喜決定畫一張《歲寒圖》送予李尚迪。然而師生之間的禮物，何以值得學界如此重視？特別是到底李尚迪為何及如何把書帶到濟州島？這個問題必須從《歲寒圖》具體的部份與創作過程說起。

《歲寒圖》分圖像與文字說明兩部份：畫名為《歲寒圖》，是阮堂贈送給弟子李尚迪的，學界一般稱為阮堂《歲寒圖》，以別於東亞傳統裡其他的《歲寒圖》。《歲寒圖》三字旁是「藕船是賞 阮堂」六字，即金正喜贈予李尚迪。四個印章：「正喜」、「阮堂」、「秋史」三個是金正喜自號的印章，象徵他不同時期的身份與信念；另一印章「長毋相忘」在全畫的右下角，指的相信是李尚迪與金正喜之間的關係。此外，《歲寒圖》也有金正喜作畫緣由的題文。該畫原大22.3 × 108.3 cm，李尚迪帶至中國，經友

<sup>82</sup> 如毛文芳對比金正喜的自題小照與許鍊的畫後，提出「畫中人彷彿被帶回到700多年前北宋元祐年間東坡被貶謫的宿命裡」；而許鍊的畫像也能「以抒情寫志的理念為像主存留人生影跡與心緒」。見毛文芳：〈禮物：朝鮮與盛清文人的畫像墨緣及相涉問題〉，《中正漢學研究》第28期（2016年12月），頁194。

<sup>83</sup> 李尚迪也曾閱賞翁方綱所藏王春波摹本，見李尚迪：《恩誦堂集續集》，文卷二〈題蘇文忠公笠屐圖〉，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sup>84</sup> 補充一點，惲敬是張曜孫伯父張惠言的好友，他們同屬陽湖派，提倡古文，而又喜作駢文，與金正喜想法不謀而合。

人鑑賞後，加上各種詩詞、題句，畫的長度延至1,388 cm。<sup>85</sup>畫像的延伸，反映了在中國再創作，使畫的內容更豐富，更有意義。

為甚麼金正喜會將《歲寒圖》送給李尚迪呢？金正喜與李尚迪有師弟之誼，自然時相往還，但更重要的是李尚迪該次到訪濟州島時，帶給金正喜《晚學集》、《大雲山房文稿》、《皇朝經世文編》等書。這些書籍與經世之學、考據學相關，正是金正喜一直以來專心從事的學問。《歲寒圖》有以下文字敘述：

去年以大雲晚學二書寄來，今年又以藕耕文編寄來，此皆非世之常有。購之千萬里之遠，積有年而得之，非一時之事也。且世之滔滔，惟權利之是趨，為之費心費力如此，而不以歸之權利，乃歸之海外蕉萃枯槁之人，如世之趨權利者。太史公云：「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君亦世之滔滔中一人，其有超然自拔於滔滔權利之外，不以權利視我耶？太史公之言非耶？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松柏是貫四時而不凋者，歲寒以前一松柏也，歲寒以後一松柏也，聖人特稱之於歲寒之後。今君之於我，由前而無加焉，由後而無損焉。然由前之君，無可稱；由後之君，亦可見稱於聖人也耶。聖人之特稱，非徒為後凋之貞操勁節而已，亦有所感發於歲寒之時者也。<sup>86</sup>

可見金正喜有感於李尚迪不嫌他落魄，慨然伸出援手。<sup>87</sup>金正喜引太史公之言為說，認為人會以權利去衡量各種事物，而李尚迪卻不著眼於權利，也不計較回報，殊為難得。他又引《論語·子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指君子在歷經亂世與逆境之後，仍能夠不變其節，值得人們欽佩。

文字的論述，當然已可窺探李尚迪在金正喜心中的重要地位；而再配合《歲寒圖》的圖像說明，更可見金正喜眼裡的李尚迪，怎樣使他如此感動及值得欣賞，從而決心創作《歲寒圖》贈予李尚迪。《歲寒圖》的構圖是這樣的：兩株松樹，右邊的老松樹向左邊年輕、筆直、茂盛的松樹傾斜，呈現依靠的樣子。老松樹有分叉分枝，一邊直接向天，一邊則有新葉在生長。松樹後面是一間小屋，屋有一扇月門。遠方兩株柏樹，枝繁葉茂。中國的文化傳統，松樹有壯志未酬的視覺表現傳統，而金正喜亦以松樹比喻自己的困境。但與其他《歲寒圖》不同的是，金正喜比喻自己為垂老的松樹，身旁卻有一株年輕、茂盛的松樹支撐着，象徵他在李尚迪的支持下活下去。再有一點，這不是單純的支撐，而是使他有如新葉那樣生長。兩株松樹，一老一

<sup>85</sup> 《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52-56。

<sup>86</sup>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四〈與李藕船〉〔五〕，頁三二下。

<sup>87</sup> 這不是特例，後來金正喜也寫信感謝李尚迪，原因是就算李尚迪使行時間不長，也將一些中國文人圖冊攜回韓國，例如這裡便提到：「槎期此迫，于囊于囊，已滿足。」見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四〈與李藕船〉〔七〕，頁三四下。

幼，象徵着生命的延續。這點生命的感應，除了從文學上解釋李尚迪與金正喜的關係，更可看到是李尚迪的譯官身份為金正喜帶來如此感慨的緣由。

從整個文圖的互動以及背後的脈絡再全盤了解，可知李尚迪把從中國所得書籍，例如惲敬的《大雲山房文稿》、賀長齡與魏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編》等，送給金正喜，讓金正喜了解中國的經學與社會情況，使金正喜大受感動之餘，又得以延長學術生命。不過一個士大夫究竟如何得書？除了在書肆購買，也許是靠別人贈送。一般來說，士大夫聚書都不會以別人的贈書為主，於是唯有借助使團隨行者，如此方可得書，而譯官就是隨行者的其中之一。李宜顯曾提到，使臣買書需要譯員幫忙聯絡中國官吏。<sup>88</sup>事實上，自十七世紀以來，漢語譯官有很多機會得到情報與書籍。他們負責安排禮儀，也會擔任齋咨官，<sup>89</sup>為兩國之間的通信擔當媒介，故不像一般的士大夫，僅有一次機會參觀北京，體會中國文化。相反，譯官使行的次數極為頻繁，容許他們為朝鮮帶來重要書籍。<sup>90</sup>如從這樣的背景重新閱讀《歲寒圖》，我們便可明白《歲寒圖》的創作由來，不應只是金正喜遭遇的呈現，而應是李尚迪如何利用譯官身份，在執行職務期間，獲得了很多運送或交換書籍物品的機會，從而讓金正喜得償所願。《歲寒圖》的文化意象，其實由擔當中介者的譯官主動導向了《歲寒圖》的具體形成故事。因此，文與圖並列一同探討外，也需把文圖背後的人際脈絡一併審視，才能夠以更全面的視角視察《歲寒圖》。

#### 四、藕船是賞——譯官李尚迪與中朝文人

前文指出《歲寒圖》的出現，與李尚迪利用其譯官身份，把書籍從中國帶到濟州有關。進一步要探索下去的是，到底誰人有機會鑑賞《歲寒圖》，而鑑賞者又是由誰去決定的。這一點除了涉及金正喜的名氣，還要看李尚迪如何主導整個交流過程和鑑賞者的多元性。

<sup>88</sup> 「譯官居其間，使臣欲購冊子，必使譯輩求諸序班，彼此互有所利，故交結甚深」。見李宜顯：《陶谷集》，卷三十〈庚子燕行雜識下〉，頁二一上。

<sup>89</sup> 齋有付給的意思，故齋咨實指傳遞信息，齋咨官也就是傳遞信息的官員。一般來說，齋咨官都是一些不涉重大事情的使臣，主要負責傳遞奏文、咨文，押解漂流人、向化人和犯越人等的任務。因需與中方朝廷官員對話交涉，故一般派遣的都不是士大夫，而是司譯院譯官。參李善洪：〈明清時期朝鮮對華外交使節初探〉，《歷史檔案》2008年第2期，頁60。

<sup>90</sup>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李尚迪著《海鄰尺牘》抄本裡，有一些經整理過的清人與李尚迪之間的書信，從中可見張曜孫要求李尚迪代為收集書籍：「前求各件及代求各件，乞細檢付下，勿遺忘。」其中包括醫書：「醫書目一帙，重託仁兄為我盡力搜訪。價值工資雖數百金，有所不惜，幸留意有以饜之午懇午懇。」李尚迪既可為張曜孫買書，當然也有辦法為金正喜買書了。見醉香山樓（編）：《海鄰尺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手抄本，「張仲遠曜孫」條，頁一下。

李尚迪獲贈《歲寒圖》，深受感動，把畫帶到中國供中國友人鑑賞。<sup>91</sup>過去的研究似乎沒有提到即時有朝鮮士大夫鑑賞過《歲寒圖》。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反映李尚迪選擇了中國友人來分享此圖，而非朝鮮文人圈子，這選擇背後顯然與譯官的思維與時代氛圍相關。因此，這幅圖在1840年完成後，很快便在1844年隨著李尚迪再次擔任使團的漢語譯官，被帶到北京。

李尚迪抵達北京後，在中國人張曜孫的協助下，決定假張曜孫的姐夫吳贊（或稱吳廷鈔，字偉卿）家雅聚，與中國文人分享手上的《歲寒圖》。張曜孫（1803–1863），字仲遠，江蘇陽湖人，常州文人代表。父親張琦（1764–1833），著有《宛鄰詩文集》等；伯父張惠言（1761–1802），著名的詞學家與經學家。張氏兄弟二人，合稱「毗陵二張」。雖然張氏家族有聲於文壇，但張曜孫家並不富，僅能以行醫自給。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舉，開始在各地擔任知縣等地方低級官員，曾參與抵抗太平軍的戰役，著有《謹言慎好之居詩》、《產孕集》以及未完稿的《續紅樓夢》。

張曜孫在文壇並無顯赫名聲，但家人則頗為稱著，最為人熟悉的是母親湯瑤卿（1761–1831）<sup>92</sup>、大姊張縉英<sup>93</sup>、二姊張細英，均有詩集行世，三姊張綸英則是著名的書法家。<sup>94</sup>美國歷史學者曼素恩（Susan Mann）著有《綴珍錄》、《張家才女》兩書，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來了解十八至十九世紀期間的清代女作家，如《綴珍錄》以十八世紀女性為中心，重新探討婦女生活與清代社會變革的互動；<sup>95</sup>《張門才女》則以微觀史學為研究方法，觀察居於江南常州的張門才女。作者利用零散的史料重整家庭關係、社交網絡以及情感生活，剖析清代才女的私人世界、書寫模式以及女性視角中的社會。<sup>96</sup>作者在論述中還特別提到，這些張門女作家作品得以問世，實際上是張曜孫從中協助的。<sup>97</sup>

<sup>91</sup> 前文引用過的金奩準〈李藕船先生傳〉，就是用不同中國文人對李尚迪的評語，以仿史傳集句的方式介紹李尚迪生平。

<sup>92</sup>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61.

<sup>93</sup> 張縉英，晚清著名女詩詞家，作品反映晚清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潮。關於張縉英的文學成就，參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sup>94</sup>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綸英」條（曼素恩〔Susan Mann〕撰、陳志明譯），頁220–21。

<sup>95</sup>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01–26.

<sup>96</sup>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pp. 62–129.

<sup>97</sup> 《澹蕪軒詩初稿》由張曜孫付梓，惜書版燒毀於太平天國之亂。李尚迪詩云：「粵西烽焰延三戶，傷心梨棗委灰塵。」見李尚迪：《恩誦堂文集》，續集卷九〈仲遠重刻伯姊孟緹夫人《澹蕪軒詩集》，屬題一言〉，頁三下至四上。參林佳蓉：〈常州才女張縉英研究〉，頁53–54。從此例可見，張曜孫是其家中女性成員詩作得以出版的關鍵，而這一點在朝鮮文人特別是李尚迪的書寫之中可以證明。參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pp. 121–22。

張家才女的作品，由李尚迪等能夠多次往來朝鮮與中國的譯官，帶到朝鮮半島，使朝鮮文壇對中國女性視角可以有一定的了解。例如李尚迪送予老師金正喜張縉英《澹菊軒集》及張綸英《綠槐書屋圖》，金正喜心有所感，分別題詩詠歎：「廿四品中澹菊如，人功神力兩相於。墨緣海外全收取，讀遍君家姊妹書。」<sup>98</sup>「閨藻天然古北碑，更從隸法點波奇。綠槐影裏傳家學，龍虎雄強屬黛眉。」<sup>99</sup>金正喜與張曜孫未謀一面，但卻在這種由譯官所築構的人際網絡中認識，以及為張家作品題詞。另一方面，金正喜知悉張曜孫醫術高明，乃在〈與權彝齋〉中說道：「張仲遠世守黃法。仲遠父子，醫理極精。第以燥土降逆煖水蟄火之法為問，得其藥方，並叩現證，要一良劑似好，伏未知如何。燥土降逆之法，恐有相合處矣。卸却重擔，夬理閒裝，消搖林泉，寔為勝服清涼幾劑，然未敢知果能諧此否。」<sup>100</sup>這些例子說明了金正喜在北京贏得讚譽，原因在李尚迪作為中介人，使金正喜能為中國人所知。因此，李尚迪與張曜孫之間的關係，才是使金正喜的《歲寒圖》得以流傳的關鍵。

可以說，金正喜《歲寒圖》的鑑賞者不是單純因金正喜的文彩而形成的，而是李尚迪作為譯官，與其中國文友所主導與形成的。在吳贊家的雅聚，李尚迪得到張曜孫的幫助，邀請各方文人一同鑑賞、分享、抒發他們對金正喜經歷、創作、畫功等的想法。<sup>101</sup>當日與會文人計有：章岳鎮、吳贊、趙振祚(?-1860)、潘遵祁(1808-1892)、潘希甫(1828-1893)、潘曾璋、馮桂芬、汪藻、曹楙堅(1786-1853)、陳慶鏞(1795-1858)、姚福增(1808-?)、吳淳韶、周翼墀、莊受祺(1810-?)、張穆(1805-1849)、張曜孫。但除了吳贊一人，實際都沒有與金正喜見過面。此外還有四位朝鮮人參與創作《歲寒圖》，他們是金正喜的後人金準學、吳慶錫的兒子吳世昌(1864)，以及李始榮(1868-1958)、鄭寅普(1893-1950)。金準學在1854年題句，其他三人則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孫在馨從藤塚鄰手上自日本購回《歲寒圖》後，題字記述孫氏將畫帶回半島的感受。<sup>102</sup>

<sup>98</sup>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十〈題澹菊軒詩後〉，頁九上。

<sup>99</sup> 同上注，〈題張曜孫四姊綠槐書屋圖〉，頁九上。

<sup>100</sup> 同上注，卷三〈與權彝齋〉〔十一〕，頁十一上。

<sup>101</sup> 亦可參考鄭後洙：〈李尚迪 과 〈歲寒圖〉 觀覽 清朝 人士 와의 交遊 (2)〉，《동양고전연구》第40輯(2010年9月)，頁223-48。

<sup>102</sup> Sung 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pp. 38-39.

十九位與《歲寒圖》有關聯的清朝人<sup>103</sup>

1	章岳鎮	不詳	江蘇 陽湖	
2	吳贊	60	江蘇 常熟	
3	趙振祚	40	江蘇 武進	1835年進士
4	潘遵祁	37	江蘇 吳縣	1845年進士
5	潘希甫	34	江蘇 吳縣	1836年舉人
6	潘曾璋	27	江蘇 吳縣	蔭生
7	馮桂芬	36	江蘇 吳縣	1840年進士
8	汪藻	31	江蘇 吳縣	
9	曹琳堅	69	江蘇 吳縣	1832年進士
10	陳慶鏞	50	福建 晉沖	1832年進士
11	姚福增	40	江蘇	1832年進士
12	吳淳韶	不詳	浙江	進士
13	周翼墀	不詳	江蘇 無錫	舉人
14	莊受祺	不詳	江蘇	1840年進士
15	張穆	40	山西 平定	貢生
16	張曜孫	37	江蘇 陽湖	1843年舉人
17	吳儁	不詳	江蘇 江陰	
18	秦緝業	32	江蘇 無錫	副貢
19	黃秩林	31	江西 宜黃	1843年舉人

根據鄭後洙的研究，題詞者合共十六人。此外畫家吳儁、秦緝業、黃秩林三人，他們在不同時間與地方鑑賞過《歲寒圖》。<sup>104</sup>鄭後洙整理這十九人的背景後，發現他們有以下的特徵：(一)年齡介於二十至六十歲間；(二)絕大部份與江蘇省，特別是陽湖派有關；<sup>105</sup>(三)身為中下層士大夫；(四)同情金正喜的遭遇，欣賞其氣節。<sup>106</sup>

<sup>103</sup> 轉引自 정후수: 〈〈歲寒圖〉 관람 清朝 19人 인물 탐구〉, 《동북아 문화연구》第14輯(2008年3月), 頁242。

<sup>104</sup> 朴現圭: 〈청 문사의 金正喜「歲寒圖」 감상과 真迹本 밖 題贊詩〉, 《大東漢文學》第25輯(2006年), 頁232。

<sup>105</sup> 鄭氏分析過參與者的背景，認為這次雅會是李尚迪與張曜孫刻意安排的。見 정후수: 〈〈歲寒圖〉 관람 清朝 19人 인물 탐구〉, 頁251。

<sup>106</sup> 정후수: 〈〈歲寒圖〉 관람 清朝 19人 인물 탐구〉, 頁239-64。

鄭氏已詳細分析這些人物的背景，茲不贅述。本文也不擬探討《歲寒圖》裡各種文學與題贊的具體內容，而是以《歲寒圖》的文和圖以及有關人物的經歷為例，闡明譯官的工作範圍及職責如何形成一個交流平台，讓中國人對朝鮮文化與社會有所認識。李尚迪從金正喜手上取得《歲寒圖》，利用前往中國工作的機會，帶至北京。在李尚迪與張曜孫的安排下，邀請友人前來鑑賞《歲寒圖》過程的同時，也讓我們了解李尚迪與金正喜身處的朝鮮社會，他們所面對的困境與經歷。值得一提的是，雅聚裡唯一見過金正喜的吳贊，在他的題贊裡可見他對金正喜的遭遇感受極其深刻：

林木似名節，松柏有本性。君子窮益堅，不容復何病。榮枯亦偶然，豈與凡卉競。時邁霜雪嚴，氣得天氣正。傳習後凋心，希賢以希聖。——奉題歲寒圖即請藕船尊兄大雅正之，海虞吳贊呈稿。<sup>107</sup>

吳贊從譯官李尚迪處得悉金正喜被貶事，深感同情，也了解到朝鮮社會各種的不公與黑暗。這一點也見於潘曾瑋所寫題贊詩：

金君海外英，夙昔聞盛名。盛名毀所歸，輒為世網嬰。滔滔視流俗，誰知士之清。懷念風塵中，早識賢友生。高誼篤終始，歲寒無渝盟。始彼松與柏，本性同賢貞。貌此後凋質，用以答厚情。——藕船先生屬，潘曾瑋。<sup>108</sup>

另外，張曜孫有信提及：「秋史翁，忽遭遠謫，殊非意料，道高覈來，真古今同慨。暉孫，企慕有年，未得一晤，尤為悵佗。」<sup>109</sup>可見，潘曾瑋因《歲寒圖》了解到朝鮮社會的政治糾紛與俗流損毀了金正喜的盛名。

中朝兩國在丙子胡亂後雖然建立緊密的朝貢關係，但實際上中國人對朝鮮認識不深。過去研究中朝交流大多聚焦在禮儀與官方層面上的交涉，甚少有觸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即使有個人間的互動，也局限於唱酬或是個人感受的表述，較少關懷對方的社會與政治困境。但在《歲寒圖》的雅會裡，可以發現李尚迪作為媒介，引導中國人認識金正喜經歷背後的朝鮮社會與文化。<sup>110</sup>

<sup>107</sup> Sung 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p. 43.

<sup>108</sup> 《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54–55；Sung L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p. 45。

<sup>109</sup> 轉引自 후지즈카 치카시 (藤塚鄰) (著), 후지즈카 아키나오 (藤塚明直) (編), 尹哲圭、李忠九、金奎璇 (譯)：《秋史 金正喜 研究：清朝文化 東傳의 研究》(果川：果川文化院，2009年)，頁877。該信收藏於藤塚鄰家中。

<sup>110</sup> 趙旻祐認為張曜孫《續紅樓夢》與金正喜《歲寒圖》有若干關係，但歲寒本是傳統文學常有觀念，不可完全確定二者有緊密的互聯影響。然而張曜孫與金正喜頗相往還，這點卻是不可忽略的。見趙旻祐：〈張曜孫『續紅樓夢』중 “歲寒樓” 와 秋史 金正喜〉，《中國語文學論集》第102輯(2017年2月)，頁269–92。

雖然張曜孫是少數《歲寒圖》創作群的中國文人裡曾認識金正喜的人，然而二人從未謀面。<sup>111</sup>但在這場雅會後，張曜孫藉著《歲寒圖》增加了對朝鮮社會的認識。張曜孫題詩裡有「傳經消息虞翻易」句，把金正喜的經歷用中國人熟悉的例子去掌握朝鮮的政治文化。虞翻(162–233)，三國時期東吳政治家，王朗(?–228)、孫權(182–252)在位期間多次向上級進諫，不大受朝臣歡迎，最終流放交州，即當時吳國的南方。在詩裡，張曜孫形容金正喜面對的是如虞翻的困境，但相信他經歷過苦難後將會是「一卷蕭疏千古意，後凋高節著清冥」。李尚迪轉述金正喜流放的遭遇，讓張曜孫了解到朝鮮社會背後的政治困擾，這也許是過去單純的酬唱裡未必能完全體會到的現象。以曹楙堅為例，他原本也不認識李尚迪與金正喜，正如他在《歲寒圖》的詩句裡所寫道一樣：「早聞秋史名，惜哉未一面。」<sup>112</sup>素未謀面又何能有深刻認識呢？事實就是曹氏在這次雅會獲得很特別的體會。曹楙堅有詩云：「城西為訪張平子，素問靈樞論不窮。下馬入門逢海客，琴尊想見畫圖中(初五月，就仲遠診脈，適與朝鮮李藕船相遇。去冬曾為仲遠題《海客琴尊圖》)。」<sup>113</sup>曹楙堅是張曜孫好友，過去多有往來，自然成為雅會座上客。而在雅會裡，曹氏另有一篇長詩，<sup>114</sup>不但記錄了參與雅會的成員，描述了雅會的情況，也闡釋了他個人對當時中國與朝鮮文壇的一些看法。<sup>115</sup>當中比較有趣的是，他在雅會認識了李尚迪，而從李尚迪口中又認識了朝鮮的文壇與社會，也體會了金正喜的困境。<sup>116</sup>由此可見，曹楙堅與金正喜本來沒有聯繫，也互不認識，但是雅會使曹氏在京城體會金正喜在濟州的遭遇。

<sup>111</sup> 張曜孫《歲寒圖》題字有云：「藕船出示金秋史先生所作《歲寒圖》屬題，率先二律，兼懷秋史先生翰墨神交，識面未知何日，殊愴然耳。」見《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54。

<sup>112</sup> 《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54–55；Sunglim Kim, “Kim Chông-hûi (1786–1856) and *Sehando*,” p. 46。

<sup>113</sup> 曹楙堅：〈乙巳新正試筆十首〉其三，載曹楙堅：《曇雲閣詩集》，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部藏本，卷六，頁十七上。

<sup>114</sup> 曹楙堅：〈乙巳正月十三日，張仲遠明府(曜孫)、吳偉卿前輩(贊)，招同李藕船(尚迪)，宴集邸齋，為賦長歌一篇，以紀其事，即送藕船歸朝鮮。同集者張石洲明經(瀛暹)、中翰潘順之(遵祁)、補之(希甫)、上舍潘玉泉(曾璋)、趙伯厚贊善(振祚)、編修莊蕙生(受祺)、馮景亭(桂芬)、姚湘坡吏部(福增)、汪鑑齋工部(藻)、黃子幹(秩林)、周席山(翼墀)兩孝廉、章仲甘上舍(岳鎮)，寫真者吳冠英，後至者侍御陳頌南也〉，載《曇雲閣詩集》，卷六，頁十八上至十九上。

<sup>115</sup> 詩云：「本朝詩人邁唐宋，新城秀水相伯仲。隨園一生弄狡獪，流傳價亦雞林重。兩當傑出真奇才，可惜壯歲薶蒿萊(與藕船論及本朝人詩派)。」提及清代詩壇兩位最主要的領軍人物，就是新城王士禎和秀水朱彝尊。詩句也諷刺袁枚，可見作者對清代詩壇相當熟悉。參李春姬：〈道咸年間詩風與朝鮮文壇詩歌取向〉，《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8期，頁184–88。

<sup>116</sup> 詩云：「阮堂海外之所宗，近聞遷謫嗟龍鍾。寒林槁木致蕭瑟，想見孤直人難容。」可見作者鑑賞過《歲寒圖》後，對金正喜的經歷有深刻的體會。

另一個例子可以看到這種網絡不斷通過文人之間的關係而擴大。參與雅會的張穆題詩云：「昔從徐孺子，獲耳阮堂名。」<sup>117</sup>張穆本也是不認識金正喜的，但徐鈞卿是金正喜的好友，張穆可以從徐鈞卿方面認識到金正喜，並在李尚迪「阮堂高弟子，納琛達神京」，使他能一覽金正喜的《歲寒圖》，並在題詩裡鼓勵金正喜：「得意與失意，絮量鴻毛輕。」在金正喜以圖來說明李尚迪的支持，以文字交待自己面對的惡劣環境時，李尚迪不離不棄。由於在閱讀的故事與李尚迪有關，大家就像是通過李尚迪得知金正喜的故事，猶如在現場一樣，對金正喜寄予同情與支持。

因此所有在《歲寒圖》的題詩創作，都是請李尚迪「奉正」的，而不是金正喜。雖然《歲寒圖》的作者是金正喜，但是讓《歲寒圖》公諸於世的則是李尚迪，這足以說明《歲寒圖》的故事脈絡背後關鍵不只是金正喜本人，而是李尚迪所建構的跨地域網絡。一些中國文人無論曾經認識金正喜與否，都在獲得邀請的情況下，通過李尚迪、吳贊或張曜孫友誼所構成的跨地域網絡，得到了解金正喜被貶以及朝鮮社會實況的機會。金正喜在李尚迪回國後，得悉《歲寒圖》的各家題跋，深受鼓勵。金正喜也借助李尚迪的網絡，聯繫了一些他只聞其名而未見其人的人物，例如常州趙振祚：

歲寒詩中趙宮詹振祚，知是何等人耶？能得其淺深耶？詩場酒所，流連光景，與他人等耶？此為申受先生之甥也。申受先生於諸甥中，特重宮詹。以申受先生之特重，知其人之出群拔類，必有外氏風也。故心竊嚮往有年，無緣梯及，今何幸歲寒詩中遇之也。必為我轉叩之，使知海外有想望趙宮詹先生風采者可也。<sup>118</sup>

文中提及的申受先生劉逢錄（1775–1829），<sup>119</sup>是《歲寒圖》題字者之一趙振祚的舅父。金正喜提到趙氏受劉逢錄的重視，相信必為出類拔群之人，故他能在詩中相遇，也希望李尚迪「為我轉叩之」。劉逢錄原來也不認識金正喜，但是金正喜得到燕行使節劉用光的協助，與徐有壬書信往來，<sup>120</sup>並在徐的贈書裡得知劉氏的經學成就與學術修為。

此例說明，李尚迪人際網絡在《歲寒圖》的文學交流裡，起了一定的作用，確定誰是圖的鑑賞者。《歲寒圖》文與圖的創作與再創作，金正喜被黨爭連累的個人經歷確是創作的最初原因，但《歲寒圖》如何被演繹以及此圖完成後的鑑賞者，甚至再創作者，便不是金正喜所能決定，而是由譯官李尚迪所形塑。因此李尚迪將《歲寒圖》

<sup>117</sup> 《秋史博物館開館圖錄》，頁54–55；Sungrim Kim, “Kim Chǒng-hŭi (1786–1856) and *Sehando*,” p. 48。

<sup>118</sup> 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四〈與李藕船〉〔六〕，頁三三上。

<sup>119</sup> 김호：〈朝鮮刊本《新編算學啟蒙》의 中國 傳播와 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第58期（2015年2月），頁1–27。

<sup>120</sup>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314–22。

帶至中國，讓其友人認識、了解甚至同情《歲寒圖》背後的故事。這些中國人則以李尚迪為中介，認識朝鮮社會的種種問題。

有趣的是，這些中國人大多只是在社會上被視為一般的文人，如進士或甚是地方舉人，不像朴齊家、金正喜來華時，接待與交流的都是翁方綱、紀昀、阮元等大儒。從身份上看，這與李尚迪作為譯官，其網絡與認識的群體，與一般士大夫有所不同。而且，李尚迪可以中文與中國人自由交談，而無溝通障礙，使得經歷不同、身份不同的文人也有機會接觸李尚迪。李尚迪是技術官僚，並非兩班貴族，在中國也不一定能輕易接觸到最高級的達官貴人。相反的是，一些不具盛名的文人才是李尚迪時常接觸交流的對象。所以，當我們觀察鑑賞者名單，可以發現他們大部份是舉人，最多只有進士出身，而沒有一位是位列高位的。雖然我們可看到《歲寒圖》在朝鮮或東亞藝術史上的定位，但如忽略了朝鮮譯官李尚迪的種種條件，便無法理解《歲寒圖》如何被安排到中國給予中國文人「再創作」。而這種再創作是為金正喜所欣賞的，因為他可以感受到在李尚迪的支持下，得到一大批素未謀面的文人支持。

衣若芬在整合各種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節文化交流圖像時，指出圖像「是一種透過表述記錄歷史的視覺文化產品」，<sup>121</sup>而《歲寒圖》絕對是表述金正喜個人故事和朝鮮社會歷史的產物。筆者願意進一步指出，這些藝術品背後被詮釋與再論述的過程，會與甚麼因素在導向有關。《歲寒圖》經李尚迪傳入中國，中國人留下的題跋則鼓勵著金正喜。如此的互動，一方面說明著李尚迪在中國的網絡，如何導引不同群體關心金正喜的遭遇；另一方面中國人藉著李尚迪等譯官的情報與消息，了解朝鮮社會的狀況，雙方甚至成為互相感嘆的對象。李尚迪將《歲寒圖》帶回給金正喜，也引起朝鮮本土對金正喜的支持，權敦仁的創作足可證明。<sup>122</sup>以上這些認識，有助我們了解中朝關係發展中微妙的文化互動，同時可反映文與圖之間互相比較，互相配合，來呈現不一樣的心態、思想以及社會網絡。

## 五、總結

本文以《歲寒圖》為切入點，觀察中朝兩國文人如何通過譯官的網絡將雙方的文學、社會狀況以及個人情感，以書畫作為載體，達到互相了解。甚至沒有見面與認識的人，也可藉著《歲寒圖》等書畫而感同身受。中介人產生的作用是雙向的，聆聽者是

<sup>121</sup>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頁53。

<sup>122</sup> 毛文芳：〈禮物：朝鮮與盛清文人的畫像墨緣及相涉問題〉，頁194；毛文芳：〈禮物：金正喜與燕京文友的畫像交誼及相涉問題〉，《漢文學論集》第42期（2015年10月），頁10。據作者說明，上述兩文，在《漢文學論集》上發表的是初稿，主要就金正喜與其清文友的畫像作為禮物，來說明「畫像文本」為近世東亞漢文化圈的共同指標。及後作者擴展研究，以更長久的畫像史作為切入點，以更多案例闡述原來的觀點，著重比較中朝兩地的畫像文化，但兩文觀點大體相符。

雙向的，表達者也是雙向的。過去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礙於研究角度的問題，有一種學術錯覺，誤以為文化的交流或許是單方面的傳播。但文化媒介是雙向的，以譯官活動為例，他們一方面是朝鮮文人認識、了解中國的介紹者，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接觸朝鮮以及其社會文化的中介人。

在中國人眼中，譯官在文人社群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認識朝鮮的話題上，還在文化交流、文學創作以及心靈的共鳴中。譯官創作獲得中國文人的欣賞，文人創作也受到譯官讚揚。在這樣的交流中，譯官不再受制於他們在朝鮮社會的身份，而受到更多的目光關注，或與中國人相交結成好友。因此，這群朝鮮譯官來到中國，除了背負國家寄予的政治與文化責任，也搖身一變成為備受當地文人重視的群體。譯官受到如此重視，在朝鮮社會反而無法得到。中國人從朝鮮譯官的創作發現文采，從他們表達的個人感受明白他們對本國社會的控訴、自身身份的不安等。譯官眼中的世界，在朝鮮脈絡之下不免片面；但透過中國人眼光，卻可看到不一樣的朝鮮世界。

金正喜與李尚迪的故事，反映譯官的網絡及文化背景決定了中國人所認識的朝鮮社會與面貌，李尚迪將金正喜的《歲寒圖》帶到中國，與吳贊、張曜孫等人分享，藉此來說明他們在朝鮮社會所面對的困境，金正喜被貶的遭遇遂成為了他們所認識朝鮮的視角。石守謙曾指出：「『外圍的中介者』在文化意象的移動過程中如何運作？其運作又如何對意象之形塑產生作用？這些問題很難僅從外在的制度運作去理解，而需要同時顧及那些中介者的『人』的層面，去思考其之所以作為的動機、盤算以及在中介過程中的各種可能的臨場因應、自我調整。」<sup>123</sup>所以，從外在的制度運作去看，是不能了解《歲寒圖》傳播的意義，故學者均從金正喜的創作背景探討；但將《歲寒圖》放在東亞的文化意象形塑來看，卻可看到李尚迪是決定該圖由誰來閱讀的主導者。從上述的例子可見，朝鮮譯官不只是擔任朝鮮人認識世界的媒介，更促使朝鮮的文化與政治面貌，按著他們的視野與角度，傳遞到中國文人社群中去。

Ulrike Hillemann 在研究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延伸過程中，強調帝國下的一些外地群體，如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或自由貿易者，如何組成一個英國的帝國資訊網絡，使不同的知識、資訊、想法在東南亞、倫敦、華南地區中流傳。這種流傳過程，使得英人掌握有關遠東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知識。<sup>124</sup>流傳在東亞的知識，並不只是一層表面的雙向交流而已。知識的傳遞方式、內涵以及形態，都已經歷過中介者的經驗、動機或網絡所引導及形塑。提倡新視野觀察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黃俊傑也曾提到：

<sup>123</sup> 石守謙：〈中介者與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頁2。

<sup>124</sup>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Cambridge Imperial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15.

從東亞文化交流的經驗來看，文本或概念在異域的交流互動之中，都有其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甚至交流活動中的人物之言語也都有其特定之語境或「語脈」，因此，文化交流中互動雙方人物都應被視為歷史舞臺上的演員，而思想則應被視為「歷史事件」。文化交流史中的諸多事件也可以被視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正是從這個論點出發，我們可以轉入關於東亞文化交流史中「再脈絡化」現象的研究方法。<sup>125</sup>

因此，《歲寒圖》的生產與流傳並非獨立的歷史事件，而是處於東亞文化史脈絡下知識網絡建構的實例。張伯偉借鑑高橋博巳的「文藝共和國」和 Peter Burke 提出的「文人共和國」(Respublica Litterarum)，指出東亞世界形成了一個充斥着多種聲音的文藝空間，<sup>126</sup>而《歲寒圖》正是張氏所描述的閱讀回響的案例，通過譯官李尚迪的工作使金正喜創作了《歲寒圖》，並由李尚迪展示給中國文人認識金正喜的處境與遭遇，並邀請中國人撰寫題跋，相關的感受最後也回到金正喜手上，使中朝文人在《歲寒圖》的事例上進行了一次閱讀環流。本文從《歲寒圖》等文藝作品的環流現象進行分析，發現朝鮮譯官在東亞世界的文化脈絡裡發揮導引作用，他們個人的學術背景、人際網絡及文化活動，對東亞文化意象產生並世意識有關鍵作用。<sup>127</sup>這種思想環流的具體操作過程，是未來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裡應多加留意的議題。

<sup>125</sup>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66。

<sup>126</sup> Peter Burke 論述歐洲語言文化史時，提到同一種語言相互通信，使彼此產生一個歸屬感，於是文人共和國的觀念遂為學界所認識。見 Peter Burke,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s 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 Essay in Periodization," *Media History* 18, nos. 3-4 (2012), pp. 395-407。相關想法轉移至東亞學界時，高橋博巳便提出以漢字為媒介，觀察東亞世界裡的對話聲音；但高橋的研究只著重朝鮮與日本，以成大中(1732-1809)、元重舉(1719-1790)與日人木村兼葭堂(1736-1802)的對話為主要探索方向，缺乏中國的聲音。見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兼葭堂》(東京：新典社，2009年)。後來韓國學者鄭珉利用藤塚鄰所收藏材料，以「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為題，回應高橋的觀點，並以洪大容、朴趾源等人(作者用的字眼為「燕巖一派」)的經歷來論述相關觀點。見 정민：《18세기 한중지식인의 문예공화국——하버드 앤칭도서관에서 만난 후지쓰카 컬렉션》(坡州：문학동네，2014年)。最後，張伯偉以李德懋《清脾錄》為例，探討朝鮮詩學如何在中日韓三地之間「環流」，如何在各地產生各種注釋、閱讀、修改的行為。見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頁164-84、207-8。

<sup>127</sup> 張伯偉提出十八世紀中葉東亞文人都有「並世意識」，意即中日韓文人因互相認識的渠道增加，彼此間都在關心當時東亞世界各種文化意識與相關情況，而借助書籍在各地流布，他們有更多的並世觀察與認識。見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文學遺產》2008年第1期，頁114-31；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頁169-70。

# 朝鮮漢語譯官與中朝文化交流網絡的構築： 以李尚迪與阮堂《歲寒圖》的關係為研究中心

(提要)

羅樂然

本文以朝鮮士大夫兼燕行使團成員金正喜(1786–1856)所創作的《歲寒圖》為研究個案，考察朝鮮譯官的語言能力、職責及個人志趣等因素如何形塑交流網絡，將朝鮮與中國士大夫或文人的交流主體與知識面向連結起來。金正喜對於學生譯官李尚迪(1803–1865)不嫌他地位低微，在他流放濟州時贈予中國書籍，大為感激。於是創製了《歲寒圖》，說明師生的關係，並送予李尚迪。李氏將圖帶到中國與友人分享，獲得熱烈回響，並延續《歲寒圖》的原作，成為了中朝之間的交流藝術品。

全文以《歲寒圖》的創作與傳播過程為探討中心，說明此作的傳播關鍵不限於原作者金正喜的名氣，而是其學生李尚迪如何因應他們的社會地位、人際網絡與文化期盼等，主導了藝術品的鑑賞者以及他們的閱讀角度與取向。即使創作者與鑑賞者沒有直接對話，但作為中介的譯官及其所建構的網絡，形塑並建構了中朝之間文人相互認知的知識。研究結果描述了東亞知識傳播的具體過程，不但改寫中朝關係史的一些既有認識，也為文化交流史的理論在過去所缺乏的研究面向作出實例的說明。

**關鍵詞：** 中朝關係 金正喜 阮堂《歲寒圖》 李尚迪 朝鮮譯官 東亞網絡

# Chosŏn Interpreters of Chine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no-Chosŏn Cultural Interaction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 Sang-jŏk and Wandong Sehandŏ

(Abstract)

Law Lok Yin

This article aims to focus on Chosŏn intellectual Kim Chŏng-hŭi's (1786–1856) *Sehandŏ*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interpreters of Chosŏn shaped the network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by their language ability, tributary dutie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When Kim was exiled in Jeju, Kim's student Yi Sang-chŏk (1803–1865), who was an interpreter of Chosŏn, still gave Kim some books from China even though he was not in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Chosŏn court. Kim appreciated having this kind of support from a student and, therefore, created *Sehandŏ* as a gift to repay Yi for the help and support. When Yi received *Sehandŏ*, he shared the painting with his Chinese friends and the response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were inscribed on the original work.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ehandŏ* will be investigated in this article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the social status,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 of Chosŏn interpreters dominated the perspective and attitude of the readership. Although the creator (Kim Chŏng-hŭi) and the readership (Chinese literati) may not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dialogue, interpreters and their network shaped the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The research findings, which reveal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n East Asia, not only rewrite the Sino-Korean history, but also offer specific examples to theorie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Keywords:** Sino-Korean relations Kim Chŏng-hŭi *Wandang Sehandŏ*  
Yi Sang-chŏk interpreters of Chosŏn network in East Asia